

良渚文化玉器原料来源探讨

何国俊 (厦门大学历史系)

良渚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年代范围大约在距今5350~4150年之间^①。良渚文化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发达的玉器制作是良渚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出土了大量种类齐全、磨制细腻、雕刻精细、花纹图案精美的玉器。

对于良渚文化玉器原料的来源,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就地取材和远地运输两种观点的分歧,但大多只停留在宏观上的分析,而缺乏针对性的专门研究,本文拟在这一方面尝试进行探讨。

一. 良渚文化是玉器文化

迄今为止,经科学发掘,良渚文化中出土玉器的遗址和墓葬多达60余处。在数量上,据初步统计,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以单件计算有6000多件(如包括私挖盗掘、流散国外的在内,总数已达上万件)^②。在种类上,良渚文化的玉器多达数十种,有璧、琮、钺、璜、玦、环、镯、圭、斧、瑗、佩、带钩、杖端饰、靴形饰、冠状饰、锥形饰、管状饰、菱形饰、三叉形饰、柱状器、纺轮、珠、圆片等等。

良渚文化的玉器主要出土于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中,集中在反山^③、瑶山^④、草鞋山^⑤、张陵山^⑥、寺墩^⑦、福泉山^⑧、赵陵山^⑨等大型墓葬中。太湖地区的这些良渚文化大墓,都建筑在人工营建的土筑高台之上,高出地面数米,形若一座小山,颇为壮观。而随葬少量玉器或没有玉器随葬的中小型墓葬却埋葬在平地上,这无疑体现了墓葬规格上的等级差别。

在随葬玉器的大墓中,同样存在着用玉等级差别。反山、瑶山墓地出土玉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为良渚文化墓葬中绝无仅有,处在良渚文化墓葬用玉的顶级。如良渚文化反山墓地,出土随葬玉器如成组、成串计有1100余号,占全部随葬品的90%以上,单件计数则多达3200余件。随葬玉器种类上有璧、琮、环、璜、镯、带钩、杖端饰、冠状饰、锥形饰、三叉形饰、柱状器、半圆形饰、圆形牌饰以及由鸟、鱼、龟、蝉

和各种瓣状饰组成的穿缀饰,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各类玉粒组成的镶嵌件等20余种。仅反山M20就出土随葬玉器170件(组)。大件的玉璧,仅反山M23一座墓随葬就多达54件。福泉山良渚文化的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有斧、璧、琮、锥形器、管、镯、佩、璜、杖首饰、带钩、鸟首、珠、环、靴形器和饰片等共计455件(粒)。比诸同为良渚文化的余杭反山及瑶山墓葬,总体上用玉数量和玉器种类约少一个数量等级,质量也有逊色。同为良渚文化的浙江海宁荷叶地墓地^⑩,多数墓用玉仅几件,又以管、珠等小件玉器居多,且质量也差。良渚文化各遗址中用玉范围之广、等级差别之大、数量之多、种类之全,是新石器时代其他文化和遗址所不能比拟的。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玉礼器,如璧、琮、圭、璜即属于《周礼》中所载的祭祀天地的“六器”,并且在良渚文化中后期玉礼器已经成组出现,以最高等级的反山M12^⑪为例。反山M12处于反山墓地中心位置,属最高级别墓葬,随葬玉礼器中,该墓组合最全,有琮、璧、钺、半圆形冠饰一组4件、叉形器及玉管、锥形饰一组、管装饰1件。纹饰图案上,“琮王”和“钺王”等4件(组)器物上装饰有20个带羽冠的完整神像。半圆形冠饰上有良渚文化唯一的一套灵兽图案。玉礼器成组现象几乎见于所有良渚文化大墓,只是由于墓葬规模等级不同,成组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上产生差别。

良渚文化随葬玉礼器的最重要代表——玉琮,形制上内圆外方,与后世天圆地方的思想相印合,极有可能是良渚社会的巫师用以贯通天地的一种神器。玉琮的每节角上都刻琢有神面纹,在反山墓地出土的大玉琮上还刻琢有形象完整的神像纹饰,可见琮是巫祭神的重器,巫通过琮来昭示神的存在,巫自身则是神的代言人和化身。当然,玉器作为神器不可能人人都可以占有,只能是巫师和统治者才能占有(而极有可能两者是一个统一体),巫同样也存在着鲜明而又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中以中心

遗迹为核心的大型礼制建筑仅见一处,意味着它只属于大巫专用,而它的主人则是这一广大地区最高等级的大巫。荷叶地墓地一类的墓主虽然也享有圆丘状的土筑高台墓地,但随葬玉器数量少,种类单一,质量次,应是属于低级别的小巫。而像福泉山、赵陵山、草鞋山等土筑高台墓地,在墓地规模和数量、玉器数量和质量等各方面都处于前两者之间,它们的主人也就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巫师。

玉器在良渚文化社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意识观念上,玉器是神的代表,是巫师用来敬神祈福的神物:在上层建筑中,玉器是统治阶层象征权力、维系统治的权物;在经济生活中,玉器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军事上,玉器(主要是玉钺)是军事统治指挥的权杖。玉器作为玉器时代的标志性事物,是良渚文化整个社会的维系物和支柱,是社会文明及意识高度浓缩的象征物。吴汝祚、牟永抗两位先生认为中国史前时代在石器时代之后,还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玉器时代有两个标志性条件:出现成组玉礼器和玉、巫、神三位一体^⑫。显然,良渚文化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已经进入了玉器时代。

二. 良渚文化玉器属于软玉

我国自新石器以来广泛用玉。殷墟甲骨文中已有用玉记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的国家。玉在矿物学上包括硬玉和软玉两种,均为链状硅酸盐矿物。软玉是致密块状的角闪石组角闪石类的透闪石(grammatite)——阳起石(actinolite)系列矿物,呈显微纤维结构,韧性很强,其品种有白玉、青(白)玉、碧玉、墨玉、黄玉等。

纵观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展,最迟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开始了有意识地制作玉器,当时采用原料大多是石髓、玛瑙、萤石之类的美石,没有发现过一件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真玉(软玉)。对软玉的认识和利用,大致滥觞于崧泽文化早中期,在崧泽墓葬中,软玉已占相当比重。发展至良渚时期,虽然萤石、叶腊石、绿松石、叶蛇纹石等似玉美石也仍在开发使用,但数量较少,且主要用于制作管、珠等小件的饰品,软玉在整个玉器组成中已占绝对优势。随着考古学技术的发展,众多专家学者运用不同的自然科学方法对良渚玉器进行原料质地测定,如矿物学比重测定、显微纤维结构分析、稀土元素特征测定、PIXE分析等等^⑬,测定对象包括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福泉山、瑶山、反山、三田社等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玉器,测定结果不但证

明良渚文化玉器大多数属于软玉(即真玉),更加有力驳斥了20世纪初李约瑟教授关于“中国古玉器都起源于新疆和田。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前139~126年)后,以和田为代表的昆仑软玉才传入中国内地,而内地不产软玉”的断言^⑭。

三. 良渚文化玉器原料产于本地

在良渚文化玉器原料来源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异地运输和就地取材两种观点的分歧。笔者认为良渚玉器原料来源于本地。

新石器时代,人们受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限,其活动范围和交通能力都极其有限。假设良渚玉器的原料真的来源于新疆和田,那就必然存在着两地之间的交往,或是良渚人群不远万里去西域采集玉料,或是新疆人群远来东方运送玉料,双方就必然存在着远古的物品交换,也就必然产生文化传播和交流,但是两者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无论是在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诸遗址和墓葬资料中,还是在新疆地区各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明显缺乏实证。从太湖流域去西域新疆远隔千山万水,险阻重重,断非新石器时代古人能力所及。

通过对良渚文化出土玉器进行的标本测定,从物理学和矿物学的各个角度同其它地区的玉石标本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良渚文化的软玉样品大都是接近平行的显微纤维结构,不同于新疆和田软玉及河南浙川、四川汶川与辽宁宽甸软玉,与我国已知的各玉矿产软玉的典型显微纤维结构均不相似,因而良渚文化玉器原料不是来自我国目前已知的软玉产地^⑮。

既然良渚玉器的原料并非异地运输,就必定是就地取材了,那么良渚玉器的原料究竟来自何处呢?

杨伯达先生经过研究论证,在他的著作《丁沙地遗址出土“玉角”考——溧阳小梅岭玉及句容茅山石即瑶琨》中指出:我国古代玉料产地三大板块——殉玕、瑶琨、璆琳,而瑶琨即东南板块,所地点即为太湖流域一带^⑯。

1982年,江苏省地质矿产局区域调查队钟华邦工程师在江苏溧阳南部天目山余脉小梅岭地区发现了透闪石软玉矿床。经过取样鉴定,标本的硬度5.5至6度,比重2.98,质地细腻坚韧,色泽呈白色、青绿色,有较好的透明度,呈蜡状光泽^⑰。1990年,考古和地质工作者在江苏溧阳小梅岭联合调查,正式发现了产于中生代燕山期花岗岩与下二叠纪栖霞组镁质大理石岩接触带玉矿,这也是迄今为止在江浙一带

发现的惟一玉矿^⑧。这就说明在矿物资源上,良渚文化人群完全有可能在本地区发现并开采玉石资源。

闻广先生在其论著《中国古玉地质考古研究的续进展》一文中介绍了溧阳小梅岭透闪石及研究成果:“据此认识(按指“热流交待成因”),检查镁质大理岩接触带致密状透闪石岩的显微结构,发现了原被当作普通透闪石岩的江苏溧阳小梅岭产于中生代燕山期花岗岩体与下二叠纪栖霞组镁质大理岩接触带的透闪石软玉,标本如彩图三(长6.2厘米)。此标本与南京市浦口营盘山崧泽文化遗址所出玉料PYM3I及江南不少崧泽与良渚文化很相似。”闻广先生从而确证了江苏溧阳小梅岭透闪石软玉已经为南京市浦口营盘山崧泽文化及江南不少崧泽、良渚文化族群玉人采集,用以磨治玉器。

近年来,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安溪镇和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杨墩发现了一些出土带有加工痕迹的玉料及半成品的地点。尤其雷甸杨墩一处出土玉料数量众多,从出土的玉料观察,其表面大多凹凸不平,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可是是人工开采的矿料。从而可以初步判断,在良渚文化遗址群及周边区域,都曾经设立过一些以天目山脉中个别山体蕴藏的玉矿为原料的专门的玉器加工制琢场所。太湖流域的史前玉器的原料应当产于本地区的天目山脉、宜溧山脉及茅山山脉的个别山体中^⑨。

在句容茅山之北、长江之南的一乡村台地上的良渚文化古遗址——丁沙地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器和“玉角”(即玉器制作后剩下的余料)。丁沙地遗址面山背水,自宝华山而出的两条小溪绕过丁沙地东注入长江,玉角极有可能就是本地出土的水玉^⑩。

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良渚文化玉器玉料产于太湖流域的玉矿,而非从外地输入。

总之,良渚文化具有十分发达的玉器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精湛,玉器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良渚文化玉器原料属于太湖流域玉矿就近采集的软玉,而非从远地运输而来。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钟礼强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注释:

①安志敏:《关于良渚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1988年第3期。

②汪遵国:《论良渚文化玉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④、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⑤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1980年)。

⑥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1982年)。

⑦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⑧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第10期。

⑨钱锋:《寺墩山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2日。

⑩刘斌:《海宁荷叶地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⑪吴汝祚、牟永抗:《玉器时代说》,《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⑫、⑬邓建:《寺墩遗址出土良渚玉器鉴定报告》,《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闻广:《苏南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考古地质学研究》,《文物》1986年第10期。

程军等:《良渚文化玉器的稀土元素特征及其考古学意义》,《稀土》2000年8月第4期第21卷。

朱海信等:《福泉山良渚文化玉器的PIXE分析》,《核技术》2001年2月第2期第24卷。

⑭《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地学,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

⑮、⑯杨伯达:《丁沙地遗址出土“玉角”考——溧阳小梅岭玉及句容茅山石即瑶琨》,《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

⑰钟华邦:《江苏溧阳县透闪石岩研究》,《岩石矿物学杂志》1990年第5期。

⑱王华田、袁旭音:《江苏小梅岭硅灰石矿床特征及其成因》,《火山地质与矿产》1996年第2期。

⑲蒋卫东:《良渚玉器的原料和制琢》,《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许智范)